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言志”

法国诗人瓦莱里在20世纪早期就说过：“我们有幸面临人类活动及生活本身的一切境况的一场深刻、迅猛、不可抗拒和全面的变革。”在当今中国，变革更甚。诗人们有幸面临这一“变革”，同时也是一个陌生的挑战。移动互联网、融媒体兴起，也极大地改变当代诗歌传统的途径。大众诗人与隐逸诗人的悖论会不会使一个真正诗人放弃自己的使命？学校诗歌教育缺失如何推进？“诗言志”就是传递人类精神、价值与文明的最好表达。本期嘉宾主持育邦对话诗人、《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

育邦：诗人是“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甚至还是“世界的推动者和塑造者”。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的身份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诗人也成为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正常的人”，即从“神”“时代骄子”走向“平民”，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诗人身份的转变，也即意味着诗歌写作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歌刊物、诗歌出版物、诗歌活动等也相应地作出了改变。

李少君：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诗言志”新论》，大概的意思是，“诗缘情”是诗歌的一般规律，诗歌起源于情感感觉，这是诗的普遍规律，但是，诗歌应该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标准，那就是“诗言志”，要传递某种理想、价值和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年代。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诗人平民化有它的道理，大家都在追求自己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价值标准，呈现一种多元化多样化，诗歌的平民化写作也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在一个人类出现困境的时代，就需要一种思想价值的引领，重提“诗言志”，既有时代的原因，更有个人的原因。我们这个时代，从疫情开始之后，包括最近安倍被刺杀一系列的事件，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新的有引导性意义的诗歌出现，需要诗人挺身而出，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好更美更善的世界，同时也慰藉和解决人们的心理困惑。

育邦：由诗歌报刊、民刊、诗选、诗选、移动互联网、电视等共同构成了整个诗歌传播体系。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李少君：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推动的关系吧。以我们《诗刊》社为例，一般首先从中国诗歌网发起诗歌征集，征集之后，从中选出优秀的作品，然后用微信号先推，经过这些选择后，比较好的作品会上纸刊，还会选入各种选本。《诗刊》发表之后，还会把一些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下一步还有法文、马来西亚文等，进行国际推介。我们把这个叫做融合发展。有些诗歌刊物自己可能没有网络，可以跟其他机构进行一个合作，比如《诗选刊》跟中国作协就有一个合作。

育邦：网络的出现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人类信息传输方式的第三次大变革。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也大大地改变诗歌写作与传播的形态。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拓宽诗歌传播形式，为推动更多的人走进和阅读诗歌，《诗刊》用“中国诗歌网视频号”开通“诗直播”，这是有益的尝试，一种探索。

李少君：“诗言志”，那么要把这种“志”弘扬，两方面都缺一不可，一方面就是要真正确立一种价值观，另外一方面要想办法用新的媒体的方式，把这种声音传播出去。《诗刊》社已经建构了一个比较大的传播体系，第一，《诗刊》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第

二，我们有一个中国诗歌网，现在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40万；第三，诗刊社的微信号和中国诗歌网的微信号订户都已经超过了50万，在国内文学期刊界绝对领先。我们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诗歌或者说文学传播平台，包括我们的快手短视频，“快来读诗”矩阵播放量已超2亿，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诗歌事件。另外，就是最近开通的视频号“诗直播”，我们坚持每天直播，现在变成了一个诗歌课，很多诗人到时必须看，一些学校还组织学生观看。新观念新思想的推广，需要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没有现代报刊，就没有新诗革命新文学革命。

我们最近做的“诗直播”，其实就是加大传播推介力度。先是中国诗歌网每天从大量的诗歌，编辑投票选出一首每日好诗，然后在中国诗歌网推荐，邀请著名诗人、评论家点评，点评之后，诗直播再进一步推广。最后，这些作品，会在《诗刊》上发表，这样一轮一轮推荐，使诗歌产生真正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选拔青年诗人和基层诗人的一种好办法。

2

育邦：在今天，诗人面临着新的变革，无论是物质、社会层面上，还是精神、心灵层面上，瓦莱里在20世纪早期说过：“我们有幸面临人类活动及生活本身的一切境况的一场深刻、迅猛、不可抗拒和全面的变革。”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变革更甚。因而诗人面临着更丰富的题材资源，但是同时也是陌生的挑战。

李少君：我想现在需要的不是对题材资源的开拓，而是需要一种站在比较高的角度的一种感觉和思想的消化能力和统合能力。要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心智，一种倾向性的价值观的主导，一种核心的思想理念来统合所有混杂的多样的材料或者说题材，否则，你就会迷失在中间。你不断的向外跟随这个潮流那个潮流，你会迷乱，因为现在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果说开始时还有着自由而丰富的特点，但不断地细分下去，已经到了某种极限，甚至可以说有点开始失控的状态。

从198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一个个人化碎片化的时代，现在则应该建立一些共识，要有社会共识才能稳定秩序，才能让人类的文明继续传承持续下去。如何建立新的人类的秩序，建构新的价值理念，诗人在这方面应该能发挥作用。因为诗歌发自心灵，直击人心，是一种本能的对时代和人心的感觉和直觉。

这两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大半年以来，不断出现新的热搜，取代前面的热搜，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事情，让你产生各种情绪，脑子都乱了，朋友圈里很多人都是焦躁地控制不止地不停刷屏，每天追踪这个追踪那个，几个月乃至两三年就这么过去了。这样还怎么做事？这样怎么能安心安身安魂？这个时候，反而觉得读诗是最好的办法，诗是唯一能看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诗总是能揭示一些什么，或者说传递一些什么，因而提供一些心灵的安慰，感觉的或真理性的，还有看哲学书也可以看进去，哲学

主要是从思想上，诗主要是从感受感觉方面，打开你，引领你，启迪你，能让你突然之间产生某种领悟，引发思考，从而得到释放，获得超越和提升，从而稳定人心。

我自己有深切体会，疫情期间被隔离在家，我就读书写作。前段写了一篇《中国的诗歌精神》，把中国的诗歌源头梳理了一下，其实我还另外写了一篇西方的诗歌精神，现在还没写完，我也全部梳理了一遍。在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中，你读这些东西，就读出一些不一样的内容，艾略特的那个《荒原》，当年其实指的是西方文明在战后面一种接近崩溃状态，他试图重新建立秩序，这样也就可以理解艾略特为什么在西方现代诗歌中地位如此之高，而且越来越高，几乎是新的祖师爷的地位。这个很像中国历史上的韩愈、苏东坡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想恢复“道”、重建标准的，韩愈对儒家的中兴，苏东坡对儒道佛的一个融合实践，他们重建了新的美学秩序和思想秩序。艾略特也是如此，整个西方现代诗歌，都在他的笼罩之下。

育邦：在当代诗歌传播中，我们也会发现传播错位情形的广泛出现。一些诗歌文本水准并不高，甚至是相当低级的，获得了广泛传播，作者也成为了“大众诗人”。而真正优秀的诗歌与诗人则默默无闻，不为大众所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隐逸的诗人”。

李少君：关于大众诗人和隐逸诗人，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对于诗人来说，应该主要是“诗言志”，坚持你的“道”，就像杜甫，在他的年代，当时儒家是一个边缘位置，道教是唐代国教，所以杜甫经常被嘲笑为“酸儒”“腐儒”，甚至有时李白都拿他开玩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比较张扬，杜甫年轻时候也是很自负的，但后来变得包容，境界逐渐开阔。杜甫坚持他的理想，有一句诗最能表达杜甫的强烈意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就是现在说的向日葵，物性趋太阳。杜甫认为自己坚守理想是一种物性，实难改变，尽管意识到“世人共鹵莽，吾道属艰难”，但仍然甘为“乾坤一腐儒”，不改其志，仿佛“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战马。杜甫虽然在唐代不是诗名很彰显，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个真正的儒家的美学代言人，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标杆、标高和标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去考虑这个名声是否显著的问题，那些喧嚣的很快就过去了。杜甫当年夸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他自己也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这里的“阴何”指阴铿和何逊，可见当时这个阴铿有多火，但现在谁知道阴铿啊。大众流行是随风而逝的，泡沫是很容易刺破的，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一下就爆掉了。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就应该“诗言志”，坚持更高的标准。如果停留在“诗缘情”这个阶段，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大众化的诗人，难以成为一个杰出的伟大的诗人。在西方也是一样。惠特曼就是“诗言志”，讴歌新大陆的自由、民主和开放气象，希望以之取代保守

对话



育邦

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诗集《忆故人》《伐桐》，小说集《少年游》，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等。现为《雨花》杂志副主编。



李少君

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十八部，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

腐朽的欧洲旧大陆，包括前面说的艾略特也是如此。

3

育邦：在诗歌教育方面，大部分青少年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还是很难进入的，很多学校的老师对于现代诗歌的教学也无能为力。可以说，现在的诗歌教育的状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学校教育往往让孩子们离诗歌越来越远。米沃什说：“在学校，我们每天被灌输，直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同代人的观念没有分别，直到我们不敢怀疑某些原理，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诗人北岛、蓝蓝、树才等愿意为孩子们、为中国的诗歌做出自己的努力，或编写了《给孩子的诗》和《给孩子的100堂诗歌课》，或亲自为孩子们上课，以弥补我们当代教育中明显的诗歌教育的缺失。那么，诗人们、诗歌媒介又能为学校诗歌教育做哪些工作呢？

李少君：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除了编选各种诗歌读本之外，我本人也编过《那些孩子们喜欢的诗歌》和《那些中学生喜欢的当代诗歌》，和其他诗人有着共同的心愿，希望把自己喜欢的诗歌推荐给大家。编辑诗歌读本其实是试图确立一种新的美学标准。诗歌写作的多样化多元化状态，也有点杂乱，所以一些诗人，编一些读诗的教材，试图寻求更多更大的共识。

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讲诗听课的人也越来越多，树才为孩子们上过很长时间诗课程，程一身也出版了一本《读诗课》，还有的是用视频的方式讲解，包括中国诗歌网的“诗直播”，有些学校组织学生观看。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诗人传诗之道的一种方式。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诗教传统，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就是基本的教育方式，诗歌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文字，诗是最高级的文字形式，诗歌代表人类文明的精髓，所以古今中外都把“诗教”作为最基本的教育方式；第二个就是教化，诗歌修养体现一个人的教养；第三个，其实诗歌有宗教性质、精神性质，诗歌里含有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诗教”实质就是要传递一种根本的思想价值，西方的《荷马史诗》也是入门教材，西方正典里常常排在第一，起到启蒙的作用，传递西方基本文明价值的作用。《诗经》在儒家经典里也排在第一。

所以，我们诗人要把我们认为正确的追求真善美的这些思想观念传播出去，进行教育普及。程一身是个教授，他把他认为的一些好的诗人作为范本，传给更多的学生。还有一些诗人，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思想理念，他进行教学教育，影响很多人。还有一些正在写诗歌方面教材的。这个其实跟五四也差不多，五四当时实际上新文学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后来进入了课堂、学校和教材，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相当于选本或者说教材，这样，五四以来的现代新文学，才真正站稳脚跟。这是社会上意识形态或者说话语权争夺的一个典型案例。我觉得“诗教”也是这样，我们既然认定我们诗是有价值的，符合我们的理想，是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而且有的还是经过了社会检验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推广出去，弘扬我们的心中之“道”，这是我的一个看法。